



2013年10月访问法国国家图书馆，终于得见遭英法联军劫掠的中国圆明园瑰宝——乾隆御制《圆明园四十景》。在法国历史学家、作家、著名记者贝尔纳·布里塞先生家书房，他拿给我一部已经泛黄的法文版旧书，封面上的作者名字，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LOU TSENG-TSIANG，那位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突然消失的袁世凯时期外交总长？那位签署卖国条约——《二十一条》，后来又坚决拒签《巴黎和约》，引发五四运动的外交家陆徵祥？他怎么会在比利时布鲁日的圣安德鲁修道院修道的呢？我立即和陪我去布里塞先生家的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王媚女士翻看书籍：1945年3月20日，比利时 DESCEE DE BROUWER 出版社出版；同年4月17日重印；6月16日第三次重印；12月8日第四次重印；1946年6月28日第五次重印。书中有比利时国王阿尔贝阁下的亲笔信。我又马上和我的北大校友——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武官李鸿飞先生取得联系，相约下次访问欧洲时，一起去修道院，寻找陆徵祥的踪迹。

2014年9月，承蒙李鸿飞武官、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原副主任刘志远和贝尔纳·布里塞等友人陪同，从巴黎坐火车到布鲁塞尔，再驱车三小时，来到比利时中部小城——布鲁日圣安德鲁修道院。修道院，古树参天，宁静谧，几个年轻修士在小道上缓缓走过。帮助前期联系的布里塞先生和李鸿飞武官带我们来到接待室，已在等候的两位修士和志愿者颌首示意，陪着我们缓步穿过长长的连廊，来到院长室。已经85岁高龄的院长带领我们参观修道院图书馆、教堂、修士宿舍区，登上二楼，来到由陆徵祥卧室改建的陆徵祥纪念室，为我们轻声讲解。室内陈列着的陆徵祥上千册藏书和无数条幅、信札、贺辞、塑像、手稿等珍贵遗物。院长告诉我们说，你们是第三批来访的中国人，最早的是2000年从台湾来的，第二批是2011年从南京来的，记得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馆员。院长特许我们打开陆

徵祥留下的条幅、信札、贺辞、手稿，翻看书籍，触摸感受到了陆徵祥的气息，还有无以数计的民国名流康有为、林森、徐世昌、王宠惠、潘公展、宋美龄和他的来往信息。最后院长带领我们穿过几个院落，缓步来到修道院院长墓地，我们站在他墓前肃立静默，感慨不已。

陆徵祥（1871.6-1949.1），字子欣，一作子兴，家住上海徐汇，原籍江苏太仓。他出生于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父亲陆云峰是一位基督教新教徒，隶属于伦敦传教会。母亲吴金灵也信仰基督教新教，不幸在他出生时落下积水之症，8年后不治身亡。1884年，陆徵祥13岁，父亲为他注册进入由内阁总理衙门主办的新式学校——上海广方言馆，主修法语；21岁毕业时考取隶属于外务部的翻译学校——北京同文馆深造，继续学习法语和法国文学。当时的陆徵祥，并不奢望当一名外交官，而是期望有机会在邮政系统谋得一个行政公职。

陆徵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先后跟随三位上司度过了整整14个年头：1890-1897年在任的许景澄，1897-1903年在任的杨儒，以及1903-1906年在任的胡惟德。许景澄对他的悉心培养，引导教诲，陆徵祥受益终身，陆徵祥晚年回忆起来，依然感恩在心：“许先生期待中国实现现代化，用今天的风尚来激活尧舜禹的精神。”此外，还鼓励他关注欧洲的宗教，接近甚至体会欧洲宗教最古老的教派，获取其核心内容和力量，将其带回中国。许景澄对国运的忧思与深重的使命感，深深打动了年轻的陆徵祥。

在许景澄培养和带领下，陆徵祥参与了众多中俄外交谈判，阻止了俄国的多个企图。1899年2月12日，陆徵祥冲破重重阻力，和在俄罗斯结识的比利时天主教姑娘培德小姐，在圣彼得堡圣卡特琳娜大教堂举行婚礼。1906年，陆徵祥出任中国驻荷兰公使。1907年夏，作为中国代表团大使，出席海牙第二次国际和平大会。1911年12月31日，在驻俄罗斯圣彼得堡公使团全体人员和常驻欧洲其他国家使团公使们的反对声中，发出了劝告宣统皇帝退位的电报。“劝告皇上，接受外国军事援助将会给帝国带来危害，为了避免流血，也出于保全王公贵胄自身，是时候让出皇位了。”1912年民国建立，奉民国总统袁世凯和内阁总理唐绍仪电命，从俄罗斯返国出任民国北京政府外交总长，以他在欧洲从事外交事务的经验，比照法国和比利时的做法，对中国的外交机构和外交官体系进行改革，将清朝

旧踪寻访： 徐汇名人陆徵祥

徐忠良

外务部改为外交部，制定《外交部官制》，奠定了中国外交体制的基础，并确立了中国外交官职业的三个原则：首先，建立外交官考试制度，解决排除当前的举荐和徇私之风；第二，在各省招聘，使得全国范围的候选人可汇聚一起，共同为国效力；第三，选用在国外学习各国语言之人才进入外交部。为中国外交事业招揽了大批专业人士。1912-1920年间，北洋政府掌控中国军政，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不已，陆徵祥先后八次出任外交总长，两度出任国务总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协约国成员的战胜国，获邀出席巴黎和会。中国政府派出外交总长陆徵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驻法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五人代表团，并以陆徵祥为团长。在巴黎和会之前，日本和西方列强已经达成了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的共识，陆徵祥和顾维钧等外交家们获知后奋起抗争，日本和西方列强纷纷通过各自驻京公使向中国政府施压，企图迫使中国政府指令陆徵祥签字认可《巴黎和约》。“突然面对这么多国代表的一致态度，北京政府认为我们的不签字做法会让中国陷入孤立，是一种不够谨慎的做法，于是正式发来指令，命我签署和约。”陆徵祥坚决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我觉得不服从命令是我的责任。我们的国家不该继续任

人宰割。我不愿意再次签署一个不平等不公正的条约，兀自决定拒绝签署。”消息传回国内，直接引发了北京大学学生发动的五四运动。

拒签巴黎和约后，夫人病情加重，陆徵祥随即转任中国驻瑞士公使，留在瑞士专心照料夫人。1926夫人在瑞士病逝，陆徵祥立即辞去中国驻瑞士公使，为夫人守丧。1927年6月，送夫人灵柩回比利时布鲁塞尔拉肯墓园安葬。7月，陆徵祥来到比利时中部小城——布鲁日的本笃会圣安德鲁修道院，成为了一名初级修道士，学习拉丁文和神学。1929年，发愿终身修道后，成为了正式修道士。1935年成为神父。1938年晋升为司铎。1945年被罗马教廷封为圣安德鲁修道院名誉院长。

1940年5月28日，德军占领比利时。1942年3月25日，圣安德鲁修道院被充作德军军营，陆徵祥和修道士们被迫离开修道院。而此时，祖国已经是遭受日寇野蛮侵略的第11年，就在纳粹的铁蹄下，陆徵祥在比利时主编《益世报·海外通讯》，以“木兰”为笔名，撰写文章，还在比利时布鲁日英国修道院教区、安弗尔圣灵教区、马利纳等地发表演讲，向欧洲介绍中国人民浴血反抗日本侵略暴行，呼吁世界人民支持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正义斗争。他说：“我们中国为求自己生存而战，也为保存文化和文明而战，我们中国是在为世界的公义和利益而战。”“不要间接地帮助日本空军杀害我们，你们为孩子买日本玩具，但你付出的钱马上就会变成成千上万的炸弹，落在我们国土上，使我们幼小的孩子惨遭杀害……”1942年7月25日，陆徵祥在布鲁日雷朗德家的沙龙演讲时，3位盖世太保闯进会场，“他们先是禁止我发言，随即抢走我手中的稿件。片刻之后，他们禁止所有人员离开，并逐个检查身份证件。”此后，陆徵祥即遭德军暴

赏通缉。巴黎和会之后，陆徵祥一直生活在欧洲，但他的心仍然紧紧地与祖国联系在一起。1949年1月，他在修道院病重，修道院院长南文主教去看望他，和他说，中国占去了您一半的心，已经不能说话的陆徵祥伸出了三根指头，院长心领神会，说中国占去了您四分之三的心。陆徵祥疲倦地笑了。陆徵祥过世后，修道院将他安葬在修道院内的院长墓地里。

关于修道问题，他在《回忆与随想》中，回顾自己一生，既有对亲人的眷恋、恩师的感激，更包含对祖国的深情，对官场的失望，描述了他自己的心路。他说“我的同胞们，甚至是最好的朋友们都难以理解何以我会决定消失在公众视线之外，直至隐身海外，来到欧洲一个修道院当修士，是怎样的动力驱使我做出令他们深感意外的举动？我的转变并非转变，而是一个使命。痛苦和考验总是留给上帝的朋友，而这些考验同时也是恩惠：窘迫境况下我的出生；8年后在同样窘迫境况下母亲过世；受杯葛的婚姻；父亲过世时，我未能奔丧尽孝；恩师被斩首；婚后无子嗣，及个人生活的最后考验：爱妻早逝。”“私人生活的种种考验之外，上帝所赐予我职业生涯的，都是常人所能企及的最高职务。然而在这些职位上同样要蒙受最严峻和永无休止的羞辱。我的公众职业生涯，伴随的是亲爱的祖国不断遭受最不公、最屈辱的那段历史。”

陆徵祥22年的修道体验、探索，是可贵的，就像在中国近代以来没有成功的洋务运动、君主立宪、民国的五权分立的制度、道路探索一样，许景澄、陆徵祥冀望从基督教教义、教规中寻找救国之路注定也是不会成功的，但他的思考、探索，以及留下的警世名言“弱国无外交”，一直警策着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奋起，富国强军强民。



外交总长陆徵祥(左二)在广方言馆会议上

资料图

桂花苑

刊头书法 沈护林

